责编： 林娜 E-mail:studytimes4@126.com Tel:010—62806240

◆宏观观察

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谨慎向好

□胡振虎

总体而言，预计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将好于2013年，但由于面临较多不确定性，应对经济增长前景持谨慎乐观预期。

呈现好于2013年迹象

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期助推世界经济增长。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都对其经济增长做出非常乐观的估计，美国《2014年总统经济报告》预测2014年美国经济增速将保持在3.2%~3.4%，远超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增长。欧盟委员会2月25日发布冬季经济展望报告称，2014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预计分别增长1.2%和1.5%。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对其经济增速制定非常可行的目标和做出十分乐观的预判，2014年中国GDP增长的目标为7.5%。同时，世界银行、IMF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大多数国际投行、研究和咨询机构也都对2014年世界经济做出优于2013年的预测。各种市场参与主体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积极、乐观预测，将有效地增强投资主体和消费者信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世界经济增长。

此外，从贸易和投资来看，全球贸易增长将有所加快。IMF1月份预测，2014年世界贸易量将增长4.5%，比上年加快1.8个百分点；世界银行1月份预测，2014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4.6%，比上年加快1.5个百分点。从通胀率和大宗商品价格来看，通货膨胀水平将略有上升，但大宗商品价格将呈现低位徘徊态势。新兴市场经济体将继续居高的通胀率，而发达经济体仍保持低通胀水平。大宗商品价格将告别高位震荡。英国共识公司2月份预测，2014年全球消费价格将上涨3%，比上年扩大0.2个百分点；世界银行1月份预测，2014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将下降0.6%，非能源价格将下跌2.6%。

从主要经济体增长趋势来看，“多速”增长是主旋律。2014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速”增长趋势将收紧、收窄，发达国家将中低速增长，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将继续普遍放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以及两者之间的分化都将加剧。主要表现为：第一，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双速”发展，未来更可能是“多速”发展，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分化为不同增速的两类经济体，发达国家也将出现分化，新兴市场经济体分化将更加严重。第二，发展中国家内部将明显分化，发达国家趋同情况占主流。2012—2013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速”复苏，目前发达国家内部落差在收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落差也在收窄，发展中国家之间落差依然保持。第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将延续，新兴市场经济体将普遍放缓。其中，美国经济增幅为2.2%~3%，欧元区约为1%，日本将下降到1%~1.2%；新兴市场经济体将普遍放缓，将低于3%，但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快经济转型，结构性改革将集聚新能量，2014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贡献将达65%。

中美经济强劲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2014年将出现“中美效应”，全球几乎所有市场主体、政治家都将高度关注中美两个大国的经济政策及内政、外交走向，最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最主要支柱。中国政府新一轮改革开放信号以及行动释放出的正能量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也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30%，大大高于中国占世界经济规模比重。从短期来看，较2013年年中和年末，美国政府目前对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管控能力增强，能较为有效地与市场沟通，向市场释放信号、引导市场预期，将对市场稳定、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期进而增强对世界经济增长信心起到非常强的“镇定剂”作用。从中长期来看，一方面，过去几年美国一直在进行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发展绿色经济并力图在生物制药、页岩气等战略性产业上实现突破。如果美国能在2014年有所斩获，将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极大的提振作用。另一方面，近些年来美国一直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目的是要推行统一标准，重塑全球贸易规则，维持全球和地区规则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倘若TPP和TTIP能取得某些实质性成果，将产生新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

不应过于乐观

2014年，世界经济呈明显增长、分化态势，但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和国债上限等问题将对美国经济、新兴市场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复苏产生拖累；欧洲经济将复苏缓慢；“安倍经济学”政策效果将呈下降趋势；新兴市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金融市场将出现波动。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面临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的挑战：美国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其他发达经济体利率将保持超低水平；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结构性改革压力以及信贷周期、投资周期和开放周期等几大周期同时结束。因此，对新一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应持谨慎态度。

世界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分化重组将加剧。2014年世界经济整体增长将加快，但增速有限，而且世界经济力量加快分化重组。第一，世界经济将面临下行压力，但风险减少，主要面临总体复苏乏力、选举年的“惰性效应”、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美国债务上限、政策失效等不确定性，并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四个影响：外需持续萎靡、放缓；汇率动荡，热钱冲击持续；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继续恶化；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呈现不确定和不稳定态势。第二，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将呈现“跷跷板”现象：在世界经济关联度加深的背景下，前些年发达经济体经济不太好，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较好；但是从2013年开始，发达经济体变好，新兴市场经济体却在变差。其中，美国、欧元区增速将缓慢加快，日本经济将回落，除中国以外的其他“金砖国家”经济表现将不如人意，而且增速加快的经济体将多于回落的经济体，并将出现分化加剧现象，主要表现为经济脱实向虚、失业率高企、通缩严重和债台高筑。第三，国际金融市场将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主要表现为汇市波动、资本外流以及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有所脱节。第四，全球经济治理将出现“碎片化”和区域化趋势。一是国际经贸规则博弈加剧，西方联手重塑国际经贸版图的意图明显加强。美、欧掀起推动新型双、多边贸易谈判的大潮，TPP和TTIP谈判取得较大进展。二是TPP和TTIP今年上半年完成谈判的可能性较大，但也存在不确定性。三是全球化仍处于十字路口。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成果不应评价过高，WTO将面临巨大挑战。

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结构性和周期性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后，虽然主要发达经济体进行了结构性改革，但仍将继续面临结构性和周期性挑战：第一，结构性改革收效甚微，有待进一步观察。发达国家比新兴市场国家早一步意识到结构改革的紧迫性，如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提振制造业竞争力、鼓励出口和创新；欧洲五国进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日本实施“安倍三支箭”。但是，由于改革进程缓慢或配套改革支撑力不够，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结构性改革收效甚微。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已穷尽其所能，继续扩张空间变小。为应对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复苏，安倍政府通过实施大规模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日元汇率大幅贬值，刺激需求的成效已开始显现。由于未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日本债务不可持续，公共债务率超过240%，新出售国债的60%~70%只能依靠日本财务省购买；2013年日元贬值18%，再贬如此幅度的可能性很小。因此，随着消费税率上调、金融资产价格继续飙升，日本经济供给面的滞胀风险加大。届时，日本采取进一步财政和货币政策可能性变小。与日本类似，2013年美国依赖于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及以此为依托进行的各种美国货币政策运作来推动经济复苏，2014年继续延续相同刺激措施的空间有限。欧元区制定了财政整顿制度，但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成果有限。而且，以超低的固定利率向市场无限量提供流动性，并将继续维持较长时间。但是，欧元区经济复苏乏力，经济活力有限。

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面临结构性和周期性挑战。2013年，世界经济发生了新变化。出乎市场预料，发达经济体经济有所复苏，但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并未出现非常好的表现。虽然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量化宽松退出之际意识到要寻找新的增长点，但经济增长仍普遍放缓、低于预期，脆弱性比较明显，通胀问题非常突出，内部落差仍将延续。尽管2013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首次超过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市场对美国联邦基准利率提高预期增强，加上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二者形成合力使资本回流美国，进而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市场波动，经济增速回落，同时伴随通货膨胀。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要实现无水分的经济增长，仍需在应对周期性经济压力的前提下进行无后患的结构性改革。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面临劳动力市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结构性改革。虽然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前一轮已经进行了一些国内改革，比如印度采取货币贬值、减税等措施，现在已没有新动作；巴西实施注重提高福利等措施，但都需要进入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几个大周期同时结束的局面。一是信贷周期。过去十几年新兴市场经济体信贷宽松，信贷收紧的预期已经形成。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没有升息，但是10年、30年期美国债券利率已经出现较大幅度上升。一旦流动性抽紧，信贷周期就将结束。二是投资周期。大规模投资下降，在俄罗斯表现得非常明显，制造业投资占2%，设备利用率达到峰值，增长难度变大。三是开放周期。过去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通过参与全球经济，获得非常大的全球化红利。未来发达国家已不再愿意让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搭便车”。

◆经济时评

重新审视产业结构

□张 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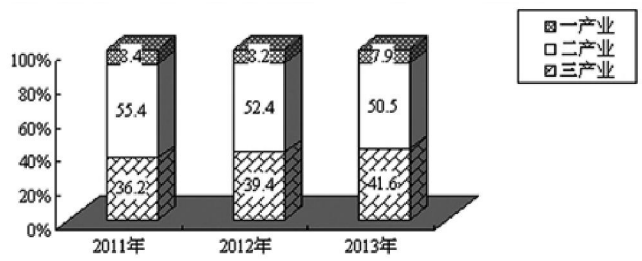
国内文献关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论述，列举问题的多，但客观分析问题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少，因而给出的建议大同小异，泛泛而谈较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

对于我国目前二、三产业比重是否合理，学界观点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严重失衡，有观点认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比重高是由我国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一方面，没有见到两种观点的交锋，厘清认识；另一方面，问题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我国产业结构比例现状是否合理，而应认真思考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如何更好地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产业结构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质的角度着眼，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中不同行业素质的分布情况，也就是指各产业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水平的分布情况；二是从量的角度看，主要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由于后者的数据可得、易分析，而前者的定量分析有一定难度，国内多数相关文献热衷于讨论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变化，而较少涉及第一、二、三产业各自的层次变化（升级改造和相互融合）。

产业结构调整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有学者认为，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对世界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新的全球治理机制、新的市场拓展空间、新的产业转移浪潮、新的产业投资机遇，跨国公司推动的产业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产业内部分工正在代替产业间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产业结构调整不再仅仅是简单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转换，还包含由同一产业内部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这些都使得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并不全部表现为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化，而主要表现为从产业链、价值链的角度突破关键环节。重新审视产业结构应加强如下方面：加快产业升级改造、 正确引导投资、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发挥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

我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赢得了发展机遇并已显著受益，也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表现出活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普遍规律，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还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同样是经济发达国家，美国与德国、英国和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模式就有所不同。中国13亿人口的日常消费品和加工产品也不可能像美国一样依靠大量进口，不能死守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不放。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不能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已有模式，特别是要注意规避已经被实践证明具有明显缺陷的模式，更不能重走美国产业空心化和服务业过度化的老路。中国大量的人口为自己成为制造业巨头做出了巨大贡献，应更加重视技术、设计和制造业的作用。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不是不要制造业，而是要在制造业的规模基础上通过创新向高端发展，着力提高制造业的科技水平及附加值，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发展互动。





◆发展之路

中国企业如何转型

——访埃森哲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李纲

□本报记者 程冠军

记者：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走过35年的历程，作为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自1993年进入中国至今已经21年，自2007年开始，埃森哲每年都会发布中国企业卓越绩效报告。您认为高绩效企业的标准是什么？

李纲：埃森哲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成长。中国企业对专业服务的认识已经由开始的被动、被迫，到今天的主动。埃森哲每年都会发布中国企业卓越绩效报告，首先必须说明这个报告不是一个排行榜。之前，我们花了5年时间，研究了全球6000家企业，发现其中有500家企业属于高绩效企业。我们所认定的高绩效企业的标准是，企业在一个长的经济周期中始终领先于它的同行，这个周期一般是十年。这个年度报告我们每年发布一次，目的不是向社会公布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因为这样就会把大家注意力分散了。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持续研究把企业稳定的、共性的东西提炼出来，然后告诉大家一个高绩效企业必须怎么做。这个报告更多的是给我们的客户一些结论性的东西。一个优秀的企业必须经得起不同的经济周期，无论高潮还是低谷总比他的同行做得更好。这样的企业基本上有三个特点：第一，这些企业对自己的市场定位都非常明确，是靠成本优势还是靠产品优势，定位很精准。第二，这些企业一定都有自己的底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软实力。第三，这些企业并非什么都做却没有专长，而是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并且这个独特能力别人无法在短时间内复制。如本田汽车，它的独特能力并不是造汽车，而是造发动机，本田发动机从最小的割草机发动机，一直做到汽车发动机。发动机技术是它的长项，因此它就可以适应不同的经济周期，汽车市场好的时候多卖汽车，汽车市场不好的时候靠发动机，所以它就能够比别人活得更好。

记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决定》看出，这次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可以说是自1978年以来的35年之后中国改革的又出发。您怎么看当前背景下的中国国企改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前景如何？

李纲：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所以谨慎是必要的。过去这几年当中，国有企业改革步子的确是慢了些。我感到这方面应该尽快扭转，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其更加市场化。这次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终于有了重大突破。首先是确立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这个理论一突破，国有企业改革走向市场化之路就成为必然。

现在大家都说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我感觉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有比较大的盲目性，一定要避免像搞运动一样一哄而上。这些年，走出去似乎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好像如果企业不走出去的话，这个企业的领导就没水平。有些企业感到在国内市场经营困难，就想到国外去做，这就有相当大的盲目性。走出去到底为了什么？有的企业在中国市场都没有做好，非要跑到国外市场，但国外市场的不可预见性更强，也会更难做。其实，经济全球化之后，中国市场在大部分行业已经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所谓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实际上在本土市场上已经实现，因此千万不能忽视本土市场，要想国际化，首先要先把本土市场做好。既然中国市场已经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企业的重要任务就是练好内功，无论是产品研发、市场营销，还是供应链管理，如果这些都没有做好，贸然走出去失败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在这方面，华为做得就比较好，它有自己非常明确的目标，其产品在中国有一份天地，但是它又一定要到其他国家去生长。过去，在全球只要一说电信设备领先者，一般都认为是思科、爱立信，而现在大家会说是华为、思科、爱立信。

记者：作为世界咨询业的巨头，埃森哲位列世界500强，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如果把你们的中西方客户作一个比较研究，您认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是什么？具体到管理方面，中国企业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李纲：第一，对于中外企业来说，企业一把手所关注的都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因此，对埃森哲来说，无论中外企业我们都必须了解一把手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这是共性。第二，就我们所做服务的内容而言，中国市场比成熟市场仍落后很多年，西方企业十年前做的事情，中国企业也许现在才开始做，中国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发展比较快，赶上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第三，中国企业的特点是体量大，比如我们在国外为一个客户做人力资源系统，这个公司可能有几万人规模已经是很大了，但在中国一个大国企可能有一百万员工，做一百万员工的人力资源系统，所碰到的复杂程度和国外企业通常的几万人，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第四，中国企业相对于西方企业有它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包括语言的单一性、文化的单一性等。比如在国外，一个几万人的公司员工可能来自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因此人力资源系统既要考虑巴西的劳工法，又要顾及法国的劳工法以及德国工会的力量等等，数量虽小，构成复杂。在中国，一个有一百万员工的企业，这些员工基本上都是来自国内。另外，与西方企业相比，中国企业还存在两个短板：一是对现代管理学的运用，大部分中国企业相对于西方起步较晚，因此在管理水平上相对薄弱。二是有些中国企业做事不够认真，无论什么事情做个“大概这样”就认为可以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企业来说，要想提高管理水平，做事情就必须精益求精。

记者：当前，中国的经济正在转型，中国的企业也在寻求新的转型升级之路。您提出中国企业转型的多重地平线，您能解释一下多重地平线的含义吗？

李纲：多重地平线不仅仅限于中国企业，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讲，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的管理团队，我的精力如果是100分，我只要花70分把今天的业务做得更好，使企业能够盈利、能够保住或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能够让客户满意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花10分的精力有选择性地忘记过去。什么叫有选择性地忘记过去？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包袱都背上。如果一个企业这也要做，那也要做，一直在做加法，这个企业肯定经营不好。因此，做企业一定要有所选择，要抛弃过去的一些东西。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柯达。柯达为什么会从一个世界最大的影像企业走向破产？当数字影像媒体兴起的时候，它一直不舍得忘记过去，对过去的成就和行业地位很留恋、很纠结。它一直认为，过去除了富士可以跟它比拼，没有人可以跟它比拼。毋庸置疑，一直以来柯达在民用影像、专业影像、医疗影像、大量文档扫描等各方面都是做得最好的。但是，当数字化的时代到来了，柯达总不愿意去抛弃过去的任何一块，总认为这些都是好东西，舍不得丢掉。结果，当整个数字化大潮袭来的时候，等它醒过来时已经太晚了。因此，我认为做企业一定要懂得有选择性地忘记过去。特别是作为CEO，你必须要看看现在做的东西，哪些需要放弃不做。除此之外，还要用20分的精力思考未来，考虑好明天要去做什么。企业腾出精力去迎接明天可能会发生的挑战，这就是多重地平线的战略。